

中国男性文人气质柔化的社会心理渊源及其文学表现

杨 雨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导致了两性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或曰“女性化”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温柔敦厚”气质的形成以及男性文人经常“作闺音”或为女性“代言”的文学现象上:这就是以“弃妇”和“妻妾”心态自拟的以男女比君臣的创作手法。这一现象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其根源就在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维持这一结构的支柱便是严密的等级秩序。理解了中国血缘纽带下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强调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的社会 家国结构中,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与对女性的期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求处于弱势伦理关系中的臣子、儿子、妻子(妾)绝对服从其君、父和夫,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属于女性的弃妇情结与妻妾情结往往会出现在男性文人的诗文中,并成为男性文人作品一道婉约而优美的风景,进而成为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亮点。

关键词:士大夫;气质柔化;以男女比君臣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 4721(2004)02- 0107- 06

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在人类个体身上有机地统一着男性与女性意识,正像人类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合而成的一样,人类个体的性格气质也具含着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荣格的理论颇具说服力。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先天的“男女同体”。荣格所谓男女同体的观念,即心理学上所谓的“男女双性化”气质。“男女双性化”(androgyny)这一名词的词根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男子和女子,所以这个概念就用来指称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的个体。其实在某一个体身上,都埋藏着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两粒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他们都会生根发芽,对个体的性格气质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男女刻板印象

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男女性别意识和气质固然有其理论和现实的依据,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刻板印象及其性别意识的形成则显然又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一般认为,男性作为一个雄性的物种,天然地应该具有雄健的体魄,具有向外扩张的攻击性和征服性,通过不断地攻击和征服而进行创造,在创造中发展其理性和逻辑性。所以海盗型性格的西方人不但具有了作为雄性物种的体魄,还具备了攻击性和征服性,因而其理性和逻辑性又在不断地攻击、征服、创造中得以充分发展。西方艺术,尤其是雕塑、绘画都着重体现人体(尤其是男性)健壮的肌肉与体魄,西方的史诗着重渲染着充满血性与欲望的战争与征服,西方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则在飞速成长的逻辑思维中进步、成熟,甚至其宗教也向哲学靠拢,成为理性的俘虏。

然而中国男人不。中国男人生下来就应该是个君子,君子是什么?孔子说:“君子无所争”;^{[1](P31)}孔子还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P78)}孔子又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P227)}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P228)}总之,“儒,柔也”,^[2]儒家教导下的谦谦君子们向来不和人争什么斗什么,因为他们要“畏”、要“戒”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尽管人们承认男性刻板印象本应是所谓乾德,也即阳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收稿日期:2002- 05- 12

作者简介:杨雨(1974-),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不息”；^{[3](P10)}女性的刻板印象则是坤德，也即阴柔，所谓“柔顺利贞”。^{[3](P26)}所谓“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婉淑慎，正位居室”。^{[4](P2404)}然而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考察，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男女双性化”的现象在中国显然并非个例，而其中又以男性的女性化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中国的家庭、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就是家（夫妻）国（君臣）同构性。这一建构形成并固定下来的原因有多个，首先应该注意其地理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古老中国的文明发展是以农业文化为奠基的，华夏子孙生活与劳动的地域范围主要在黄河流域，这一领域四周都有天然的屏障将其与外界阻隔开来。远古的华夏子民向来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主动离开辛勤耕耘和培植过的土地与家园，他们不像西方的商业航海民族与游牧民族那样，必须不断向外扩张，主动向外寻求赖以生存的物质与财富，将遥远的外部世界作为谋生的必由之路。因此远古的华夏文化是在几乎没有接受其他外来文明的历史背景下独立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在这样封闭的文化发展环境中，中国历代皇帝都将自己视为“天子”，是主宰天下的帝王，而这个天下，就是中国。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人只有“天下”的概念，而不知有“世界”，主宰这个“天下”的唯一合理的价值体系，就是儒家文化所创立的价值体系。儒家文化最强调的一点便是“礼”，说穿了，儒家文化拼命维护的“礼”其实就是一种秩序，它规定着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更不可颠倒的关系。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礼”与“仁”讲的都是如何维护这既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社会基本秩序中最为基本的当是男女关系，女子就是构造金字塔般人际秩序最底端的“砖石”。“中国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和衰落之所以能够在所谓大乱大治的恶性循环中死而又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以最弱的女子作为最下层的欺压对象，调节着普遍压抑下的绝望情绪。”^{[5](P191)}在男权文化秩序下的女性，无论处于哪一个阶级和阶层，女子受的压迫总是比男性沉重，因为在不同阶级的压制之外，女性还受到本阶级男性的束缚，女性地位的卑贱也就规定了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要求，从而规定了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

先来看看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对女性地位的规定。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开始，女子就与小人一样被排除出了正常的“人”的范畴，显然，“人”指的是男人，或者说是儒家文化认同的君子，而女子是在“人”的范畴之外，受“人”的控制与掌握的。换言之，女子是“人”的附庸，她的活动从属于“人”的活动，她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生存价值。《说文》云：“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2](P259)}段玉裁注云：“妇主服事人者也……妇人，伏于人也。”^{[6](P614)}说明女子之道在于“服从”，服从的对象当然是男子，遵从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这是男权社会对女子的要求。只有这样，男性的优越地位才得以保障。男性社会对女子是这样要求的，女子对自身性别角色的意识和要求也从认同到屈从到最后习惯于男性权威，班昭之《女诫》就是从男性权威的视角对女子品德、行为作了严格规定，首当其冲的便是“卑弱”，“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7](P48)}

女子生来就是卑弱的，低下的，这一认识从男性社会意识中被灌输到女性头脑中，女性被认为是卑下的，因此男性对女性的钳制与支配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女性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卑下的，因此她认为服从男性的支配是理所当然的事。夫御妇，妇事夫，威仪立而义理成。既然男女天生就有尊卑之分，则夫御妇以“刚”，妇事夫以“柔”，“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噬；生女如鼠，犹恐其虎’”。^{[7](P49)}所有有关妇德妇行的训诫都在喋喋不休地告诉妇女应该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接受男性的奴役与驾御，所有这些教条显然规定了女子之美在于柔顺。与之相对且应相称的是男子之美在于刚强，如“夫者天也”，“夫，阳也”等等。但是，从上面引述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于女性柔顺的规定，总是具体的；而对于男性“阳刚”的一面，却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在作为“阴”、“阳”观念上的抽象比较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规定了男性“阳刚”的性质；但在具体的社会行为和个人品行方面，由于家（夫妻）国（君臣）同构性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使上述妻女的刻板形象要求便自然反射到对臣男美德的要求上，因此男性士大夫的美德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阳刚”，竟然往往也偏向于柔顺谦卑，试略作比较。

首先是忠贞。“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7](P49)}烈女不事二夫，在妇女的逆来顺受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忠贞。而男子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P41)}明确规定臣道亦为“忠”，“事君须是忠”。君可以择臣而使，臣却不能择君而事。其次是谦顺。“温、良、恭、俭、让”这是对君子的要求。郑玄《六艺论》更是一语中的：“君道刚严，臣道柔顺。”《女诫》对女子的要求亦是如此：“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7](P50)}再次是行为的谨慎恭敬，小心翼翼。《论语》对男性的要求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1](P7)}“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P157)}真可谓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朱熹在《童蒙须知》中也从行为举止上对“子

弟”们作出了种种要求:谈话时“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时“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吃饭时“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警声响”;“凡侍长者侧,必正立拱手”;“凡待婢仆,必端严,勿得与之嬉笑”……而《女诫》对女子的要求则除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之外,还须“专心正色”：“礼义居，耳无淫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为专心正色矣。”^{[7](P50)}

其实,一味地温柔恭顺原本似乎并不是儒家圣贤和士大夫们的初衷,从古文字材料来看,金文的“士”为斧形。在中国古代,斧钺既是王权(军事首领)的象征,又是初民战、猎、农、工的最基本根据,初民的成年男子都同时具有“战士”的身份。“在早期墓葬之中,斧钺已被证明为是男性与首领的标志之物(女性的标志和象征则是纺轮)”^{[8](32)}可见“士”本来就是“战士”的尊称,则其刻板印象当然应是勇猛、刚强与征服。按理,士大夫为文著说时也应表现这一性别意识,但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证明,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管同《与友人论文书》就说:“仆谓(文)与其偏于阴也,则无宁偏于阳”,“贵阳而贱阴,信刚而黜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为德者也。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圣贤论人,重刚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顺。夫为文之道,岂异乎于此乎?”“古来文人,陈义吐辞,徐婉不失态度,历代多有。至若骏桀廉悍,称雄才而足好为‘刚’者,千百年而后一遇焉。甚矣,‘阳’之足贵也!”^[9]这段话证明了一个事实:在儒家“礼”和“理”的规范下,以“儒”为基本特质的中国士大夫便愈来愈温良恭谨,虽然“圣人”曾有重“刚”重“宏毅”的取舍,毕竟“徐婉”温柔者众,而“骏桀廉悍,称雄才而足好为刚者,千百年而后一遇焉。”^{[9](第3卷 P517)}

二、士大夫性格柔化的社会根源

士大夫性格的“女性化”或曰“柔化”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温柔敦厚”气质的形成以及男性文人经常以“女性”自拟的文学现象上,这一表现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其社会根源就在于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结构,奠定这一结构的基石是宗法制度,维持这一结构的支柱便是严密的等级秩序。

中国宗族奴隶制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其政治组织、经济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夫妻之间以夫权为绝对权威,家庭中以父权为最高权威,宗族以族权为最高权威,推而广之,则国家以君权为最高权威。周公制礼则将这一等级秩序进一步确定了下来。

周代以来形成的宗法制社会造成的家国一体之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西方社会之“平等”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市场,西方之政教一体的社会结构使得西方人很早就认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直接忠实于上帝,但上帝其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此世间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绝对的尊卑贵贱。中国淡薄的宗教观念使中国文化着眼于人伦纲常,而不对上帝与宇宙发问,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也有一个虚化的“天”,那么这个“天”很快就在人间找到了一个替身——天子,“君权神授”,因此服从天子就是服从天命,所有子民都应无条件忠实于皇帝,而不是忠实于“天”,就像西方人之忠实于“上帝”。皇帝高高端居在“金字塔”的尖端,他的地位是“天”赋予的,是不容摧毁的;那么他的命令就是“天”的命令,是不容反抗的。整个“天下”,就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是他指挥下的一个“家”,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儿子”,在他的眼里,国即是家,家即是国,既是他一人的家,也是他一人的国,治国亦同于治家:“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提出的“王道三纲”之说,宣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到了宋代,“三纲五常”更被宣扬为“亘古亘今不可易”、“千万年磨灭不得”^{[10](卷 24P597)}的“天理”,朱熹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1](P8)}根据“阳胜阴”、“理一分殊”的理论,则君臣父子夫妻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名分不同,道理则一,就是如何统治与如何接受统治的道理,事夫、事父、事君都是同一个“天理”。国家政权的家族化,亦是家族权利的政治化,正如一国只能容一君,事君须讲忠、顺不能忤逆一样,“一家亦只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立,所谓尊无二上”,^{[10](卷 68, P1683)}事父事家长(族长)也应该孝顺。

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规范中对男子的要求亦如同女子一样,讲究忠、顺、谦、卑。因为按照三纲五常的这一“天理”,女子且不说,她是绝对的被统治对象,而男子也同样是绝对的被统治对象。从生下来起,男子就陷入家庭的“父子”关系中,“父为子纲”限定了他的顺从地位。当他成人进入社会以后,“君为臣纲”也同样限定了他的顺从地位,事父须谦卑恭顺,事君同一道理。因此无论在社会还是家族中,一个男子往往承担着多种角色,他既是“夫妻”关系中的“夫”,也可能是“父子”关系中的“父”,他同时必然是“父子”关系中的“子”和“君臣”关系中的“臣”。当他扮演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时,他是主宰者,而他必然扮演的儿子与臣子的角色又决定了他是谦顺者。即使是贵为君王,能摆脱君臣之间的附庸,可君王必然也是人子,

“孝道”也是他必须要遵守的规范。换言之,男子的主宰地位是相对的,他的附庸地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他的统治地位是相对的,被统治地位却是绝对的。这一秩序的积极面,是中国士人及其文化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质彬彬、温柔敦厚气质的形成。这一秩序的消极方面,是中国的男性在成长过程、社会化过程中经受了太多的束缚与“抛光”,仿佛一枚有棱有角的石头被磨得光滑妥溜,其本性中征服、进攻的一面被掩盖甚至完全湮没,造成性格中的软弱与被动。一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宋朝皇帝,在面对侵略与进攻时表现出的懦弱胆怯就显示了这一制度的消极性。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在乱世中才会冒出不曾完全被礼法侵蚀的“铁血英雄”(如曹操);往往在开国之初的皇帝身上我们才能找到睥睨四海、唯我独尊的万丈雄心与豪气(如宋太祖);往往是在儒家价值体系受到藐视、破坏甚至摧毁的时候,中国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人性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与张扬,如唐代。但这样的时代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并不常见,儒家文化体系的建构在治而又乱、乱而又治的历史循环中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坚挺,因此大部分的中国士人还是只能处在谦恭顺从的被统治地位上。正是在这一点上,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差异寻求到了共同点。

理解了中国血缘纽带下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与对女性的期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属于女性的弃妇情结与妻妾情结往往会出现在男性文人的篇章中,并成为男性文人作品一道婉约而优美的风景,进而成为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亮点。而且不可否认,正是这样一个情结的积淀,才使中国的士大夫在不背离“诗教”传统的前提下,在文学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张扬自己性格和思维方式中潜伏着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就格外突出地表现在以男女比君臣的文学创作手法上,又在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的宋代得到了尤其充分的释放。

三、中国士大夫气质的柔化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以男女比君臣”的弃妇情结与妻妾情结

其实,最早从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开始,男女比君臣的文学创作手法已经形成并成熟,正所谓“惜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12](P749)}在《楚辞》中,男女比君臣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创作主体异化为女性,即创作主体以女性口吻袒露自己美丽的容貌与高洁的情操,表白对君(男性)永恒的忠诚与期待;二是将创作对象异化为女性,即以美人喻君,将创作主体思君之眷顾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追慕和相思。将臣比作处于弱势的女子,将君拟为处于强势的男子,上文已交代其社会根源。将臣比作男子,而君则拟为美人,这在女性占有较崇高地位的母系社会、或脱胎于母权制不久的社会形态中还具备存在的基础,但在父权制逐步代替母权制而完全进入父系社会之后,臣就很难再将自己放在男性主动追求的地位,而将君王放在被追求的“美人”的位置,自己往往就“沦”为弱势形态的女子——或为爱妾(妻),或为弃妇。这两种形式自《楚辞》以后,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都占据过一定的位置,以美人喻君在张衡的《四愁诗》中就得到了继承,曹植的《洛神赋》据说也有这种寓意。但随着儒学体系的确立与成熟,母权余威的丧失殆尽,妻妾和弃妇心态显然越来越被士人们引为“同道”,而把自己摆在男性主动追求者的位置、把君王放在被动的“美人”位置上的创作声音则越来越微茫了。因此我们追溯的重点就在于臣自比为“美人”,而君就是“美人”思慕、忠诚的对象。还是先从《楚辞》谈起。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3](第1卷 P154-155)这段文字将《离骚》比兴意象之运用解释得十分清楚,明确指出《离骚》中将男女情爱题材赋予了政治含义,香草则是美好事物的泛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美人”即是屈原(君子)的自指,这位“美人”既重内修,又重外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不独内外兼美,且对君有着无比的坚贞:“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美人”之美招致众“女”的嫉妒,引起君王对己的猜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美人”不愿与“恶”为伍,不得已而流亡他乡:“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即使“美人”被弃后始终未得到君王的信任与眷顾,她也从始至终都坚信君王是“爱”她的,是信任她的,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只是暂时被一群小人所蒙蔽,才会亲小人远贤臣,因而即使在放逐中“她”也仍然思念着他,希冀着与他重修旧好:“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于是“美人”之遭遇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思想感情均蕴涵在这似怨似恨、似哀似泣的倾诉之中,“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4](P2485)}屈原所开创的“香草美人”传统就由此而对后世贤人君子们起着指引道路与疏导怨愤的作用,其意象的指喻也影响了后世的诗文创作。

至于《诗经》,则正如朱熹所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5](P1)}《诗经》的大部分作品确实原本与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但解诗者将其附会成政治诗篇,则依然赋予了《诗》以男女君臣的含义。《诗经》中最明显地抒发弃妇之情的当是《氓》篇。“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便是弃妇对负心郎的控诉。但许多这样的情诗都成了贤人君子思君报国的肺腑之言,如《隰桑》本是妇女抒发对丈夫的相思之情的诗篇,却被《毛诗序》附会成:“《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也。”^{[16](P24)}那么爱情的篇章也蕴涵君臣之思,诗中的女主人公就成了眷眷不忘君恩的“弃妇”。再如《伯兮》和《君子于役》,显然是以“妻妾”口吻叙写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思念与独处闺中的寂寞哀伤,而《毛诗序》解云:“《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忘返焉。”^{[16](P24)}“《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16](P256)}毛说虽然穿凿,但也说明了一点,妻妾思念丈夫,弃妇怨情恋情既交织又矛盾的心情,与君子贤人思明君、抒己之志确有相通之点。

有了《诗》《骚》的典范,后人多继承其男女喻君臣的传统,因为历朝历代都有自负高才而又得不到重用、甚至被猜忌、贬斥而终身受压抑的才子志士,他们就是那空谷幽兰般品貌兼修的“美女佳人”,或思念“夫君”而长年不得相见;或深闺独处,无缘在“心上人”面前展示才貌为自己赢得青睐与眷宠;又或者曾是“夫君”宠幸的娇妻美妾,却因其他“妻妾”的妒忌陷害而失去“丈夫”的信任与爱怜,被迫流落他方,独自品尝“失宠”后的孤寂与痛苦。如曹植《杂诗》之四《美女篇》等作品就在感叹“美人迟暮”的哀怨中抒写着诗人怀才不遇、容华将逝的感叹。杜甫的《佳人》从诗面上看是一首较为典型的弃妇诗,被弃的原因一是兄弟遭丧无所依托,二是丈夫喜新厌旧,但被弃的佳人并未因此而染上尘俗,依然保持着高洁贞正的情操,清杨伦笺曰:“此因所见有感,亦带自寓意。”^{[17](P230)}“每饭不忘君国”的杜甫以“佳人”自况,抒写自己不随波逐流、不染浊流的高尚品德,亦抒发对世情的忧虑与哀感。

从以上对以男女比君臣之文学传统的简单回顾来看,封建时代臣子之“弃妇”与“妻妾”心态是不难理解的,确是“逐臣与弃妾,零落自可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宗法制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臣子的地位与妻妾地位的相仿,亦决定了两者情感的相通。但臣子的“弃妇”与“妻妾”心态,使得中国的男性诗人在咀嚼自身遭遇、抱负之时,往往隐藏了锋芒毕露的阳刚之气,而表现出哀怨凄婉的阴柔之美,这一美感在宋词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辛弃疾的《摸鱼儿》便是典型的“弃臣”之词而以弃妇心态自拟: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慷慨沉痛之极的词中连用“长门”、“玉环”、“飞燕”三个典故,三位女子遭遇虽然不尽相同,但结局却有相似之处,被弃的方式虽有不同,被弃的事实俱各存在,三个典故叠加在此,辛词之“弃妇”心态昭然可见。

与弃妇情结相仿的则是妻妾情结。正如同弃妇之存在在中国古代的合理性一样,稍有点头脑的“爱妾(妻)”也是要常常居安思危的,因为一时的宠爱不等于一辈子的真情,而有着休妻、纳妾、寻花问柳之权利的丈夫往往“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妻子怕休,妾怕失宠,无论何种身份都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下,“妾有一夫君二妇,一年夫婿半年亲”。这位丈夫还只有一妻一妾而已,遑论其他多妾之风流子了。而与丈夫身份相似的君王也是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某个臣子或抛弃某个臣子,臣与臣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丈夫身边的妻妾一样:他们必须不断谋求君王的宠信,不断提防其他臣子的排挤,以免使自己沦于“弃妇”的地位。以“妻妾”心态自拟的词作亦比比皆是,试看: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

沈际飞说此词“一若关情,一若不关情”,^{[18](P27)}颇费寻思。张惠言更说什么:“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悟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18](P28)}无论张惠言此说有多穿凿,至少,身居显位的文忠公以这样一位“怨女”的口气写这样一首伤春的词,有一些难以言传的心酸和忧愁总是肯定的了。如果以我们现在所谓“成功人士”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欧阳修无疑应算功成名就,以他的地位成就写这样伤感婉媚的诗篇,似乎颇有些不合身份不合时宜,然反过来一想,他也只不过是“东君”身边的一位“爱妾”而已,既有可能遭致其他“妻妾”的妒忌或排挤,也有可能随时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被弃,因此暂时的宠幸并不能彻底摒除心中的忧患意识,他写这样一首词也就不难理解

了。这就是所谓“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了。^[19] (第3卷 P391)

尽管中国士大夫的“弃妇”与“爱妾”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有宋一朝，自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后，中国男性文人就论为了“弃妇”与“妻妾”之态，而无论是“弃妇”还是“妻妾”，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时不时含蓄合度地、温柔敦厚地表达一下他们或淡或浓的哀愁。尽管他们可能满怀经世济民的壮志，然而在他们的笔尖却只能挥洒经意与不经意的柔情，百炼钢终化为绕指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士大夫的“柔化”也许使中国文化的气质过于保守了些，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柔化，使中国以抒情诗独步世界，成为一个抒情的、诗的国度。

参考文献：

- [1] 李学勤．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 李学勤．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张华．女史箴[A]．萧统．文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 庠立．男女°夫妻°家国[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7] 班昭．女诫[A]．王延梯．中国古代女作家集[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 [8]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9] 管同．与友人论文书[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0]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1] 朱熹．论语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2] 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A]．张宗．词林纪事[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3] 汪逸．离骚经序[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5] 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 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7] 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8] 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9] 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Origin of Scholar-officials' Makings Getting Tender in Feudal China and Its Reflection in Literature

YANG 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Social psychology holds that, the stiff impression of man bears the main feature of manliness, while that of woman bears tenderness. Ye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unique structur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sychology caused the two different stiff impressions of both sexes to get assimilated—“tenderization”. The “tenderization” or “femalization” of scholar-officials' nature wa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quality of “gentle and honest” and male literati speaking for women, and the phenomenon was a sort of composition technique in which authors had the mentality of regarding themselves as “deserted wife” and “concubine” when comparing male and female to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The phenomenon contained profou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 origin of which was the social political structure of family-state unity based on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the major element maintaining the structure was the strict stratum system. Looking into the patriarchal clan social structure under Chinese link of consanguinity, we find it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at, in a social/national structure stressing the et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father and son, husband and wife, the expectation upon the sexual role of male was amazingly similar to that upon female-subjects, sons and wives (or concubines) under disadvantaged situation in the ethic relationship should absolutely obey their monarch, father and husband. And that why the complex, of abandoned wife and concubine, that belonged to female frequently occurred in letters of male literati and became a kind of subtle and elegant scenery and then even further the most unique highlight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Official scholar; Makings; Tenderization; Compare male and female to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责任编辑 立华]